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

周竞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

周竞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以
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 / 周竞风著. —南京：南
京大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305-15110-1

I. ①新… II. ①周… III. ①中国共产党—干部培养
—研究—1949~1956 IV. ①D26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002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 1949—1956 年江苏省为中心

著 者 周竞风
责任编辑 陆蕊含 编辑热线 025-83592041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扬州市江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25 字数 378 千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5110-1
定 价 46.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一

干部队伍建设对一个政党来说至关重要,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从某种角度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也是党不断加强和改进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地位和社会环境巨大变化,面对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迅速采取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从组织建设到思想作风建设,从文化教育到业务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在短时间内即取得了显著成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不仅有效应对了当时国内外的复杂情势,有力地推动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并且为执政条件下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对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

从这个角度来说,周竞风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的书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某些不足,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另外,综观全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特点:

首先,研究视角的独特。如在时段选择上,放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将干部队伍建设的考察放在一个背景更加特殊、矛盾更加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从而进一步突出从革命到执政,转型背景下干部队伍建设的必要性、艰巨性,也更好地总结出干部队伍建设本身所要求的一些内在的规定性东西。在研究对象上,和以往许多著作不同,而是选择了一个更具有样本意义的地区——江苏省作为考察中心,通过以小见大方式,使问题分析更加深入、具体,也避免了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通论的范式。

其次,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以江苏省为典型进行个案分析,既可以使研究视角进一步聚焦,同时也利于资料的收集。周竞风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主要依托江苏省档案馆,又广泛探访国内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收集了

包括各种历史文献、报刊资料、地方史志等大量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并对史料进行了认真鉴别,因而对许多问题的论述,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详尽可信,还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相信也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

第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更切合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但又与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人才学等多学科有着密切关系。周竞风对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实践的历史考察,在理论分析框架上,首先立足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即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充分地占有史料和对史料进行客观、理性分析,努力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问题意识”,积极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才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分析、论述,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使有关问题研究更加深入透辟,从而更好地发挥历史研究鉴往知来的重要社会功能。

总之,周竞风这本专著,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初步厘清了这一过程的历史脉络,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与不足。本书虽有不完善之处,但对于当下干部队伍建设仍可较好地起到添砖加瓦作用,亦即资政作用。周竞风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原师从高华教授,后因高华教授病逝,由我接手指导。在学期间,认真刻苦,成绩斐然,此书出版,可以说是他多年思考、研究的成果,是他在学术和事业上取得的一个重要进步,作为指导老师,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并希望他今后能对有关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并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朱庆葆
2015年8月

序 二

读周竞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的历史考察——以 1949—1956 年江苏省为中心》，收益良多，感慨系之。

打天下，坐江山。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随即揭开新的篇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制度并向社会主义转变，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

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当时，欲在这样一个百废待兴、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中完成如此艰巨任务，需要各种条件，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则是：要打造一支能适应新形势、满足新需要的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中共是这样做了，因而取得了辉煌成绩。当然，囿于社会、历史的因素，这当中也有若干不足、失误，从而给当时及其后事业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亦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谓。所以，总结其得失、经验教训，对于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本人一直企盼能读到这类著作，但常有阙望之感。竞风此作，使我能了此夙愿，先睹之后，深感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全书分六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概况；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和建设；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理论和政策水平；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迅速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干部队伍，等等。诸凡当时干部队伍建设所有的举措，应有尽有，囊括无遗。不仅将成绩讲够，同时也将不足、失误讲透。一册在手，这段历史尽收眼底。而选择以江苏省为中心进行考察，更带有相当的典型性。书中材料之翔实具体，研究方法之严谨恰当，论述分析之实事求是、深刻中肯，引人入胜的新视角及论点中的新意，更令人必一气读完而后快，欲罢而不能。

不过，在上述诸内容中，窃以为最具价值和新意者，当属“迅速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和“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干部队伍”这两部分。坦率地讲，干部队伍的整顿和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理论和政策水平，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对中共领导层而言，实属驾轻就熟，因为在漫长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在

不同时期这些活动早就进行多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环境中新形势下，重复以往成功的做法，固然要花气力，也要创新，但效果可预期，并且大体不会出现过多意外和偏差。而提高干部文化水平和建设专业化干部队伍，则是前所未遇的新课题。道理很简单：中共此前从事革命，依靠的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实积极，聪敏能干，但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其文化的水平总体低下；其“专业”主要是革命特别是武装斗争，对技术等领域当属外行。

问题在于：马上取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管理整个社会，领导经济建设，逐步实现现代化，这就需要干部具备相当的文化知识，拥有相当数量的专业化干部，否则，不仅无法完成这一崭新的历史任务，还会犯错误，造成损失——凭借过去的经验，以发动人民战争的大呼隆方法从事建设，以外行领导内行、依靠权力瞎指挥，“无知无畏”蛮干乱干，我们吞食的这些行为造成的苦果还少吗？

中共当时敏锐地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这些短板，采取了不少有效措施予以弥补，比如，在提高干部文化水平方面确实下过功夫，花过力气。书中所述十分详尽，完全符合事实和记忆。当年我就读的小学隔壁就是江苏省干部文化学校。我们这些顽童常从墙缝中或爬到墙头上向这个大校园窥视，甚至溜进去玩一番，印象中，总能看到一批大人像我们一样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上课，起立回答问题，和着音乐做广播体操，早晨隔墙也会听到南腔北调、怪里怪气的朗读声，当我们起哄、嘲笑他们念错时，老师总要制止我们的胡闹，告诫道，这些伯伯叔叔原来打日本、打老蒋没时间学文化，现在来给他们补课，并不忘说一声，你们可要珍惜从小能读书的机会，好好学习啊！

干部提高了文化，对党的工作当然有益：能提高理论、政策、管理水平，特别是能进一步掌握专业知识，成长为专业技术干部，懂得要按规律办事，再不敢乱来。许多干部能抵制“大跃进”等主观主义“左”祸，与此不无关系。

然而，中共的这种正确努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未能很好坚持而是逐步式微。在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突破苏联模式弊端时，曾将此一并予以否定。事实上，十月革命后，苏联即曾将大批工农干部包括赫鲁晓夫等人送入正规院校学习。这应该是苏联的一条成功经验。我们本来是学习和借鉴了这一成功经验，已取得了成效，轻易予以抛弃，不啻于列宁所说，泼洗澡水时连孩子一起泼掉了。而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潮越来越泛滥，一些人自己从来读书不辍，并以此自我炫耀，但却

不喜欢学生和普通干部读书学文化,在“书越读越蠢”、“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指责声中,学生都不敢多读书了,遑论对政治最敏感的干部们。“文化大革命”狂飙席卷华夏大地后,普通学校停课,干部文化教育机构不仅六亲同运关门大捷,更被恶谥为培养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黑爪牙的温床,成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一大罪状。党内更早有“鄙薄技术工作”的传统,“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此时专业化干部更成了准专政对象的“老九”。一种鄙视文化、背离文明、以粗俗为美、以无知为荣、以“大老粗”自傲的风气在党内和社会迅速蔓延。不谈深远危害,即使当时的直接后果也是触目惊心:在三峡水库尚未充分论证、三峡水库尚未兴建时,突然先建作为此库下游调节库的葛洲坝;主观认定南方一定有煤,不惜工本开采,结果劳民伤财而基本无获……当如今抚摸这些浸染血泪的创伤时,痛定思痛,恰从反面证明提高干部文化水平、培养专业化干部是何等重要!

所以,此书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面对硕果,应该感谢周竞风所作的艰辛努力。

由此亦可看出周竞风的治学特点。竞风在南京大学先后师从高华、朱庆葆两位著名教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深受南大和两位教授崇尚学术、严谨治学、反对急功近利、鄙视“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学术传统和作风的熏陶,在学术实践中处处体现了这种学术传承,特别强调厚积薄发,精益求精。据我所知,此书是他2012年撰写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他未急于付梓,而是在此基础上精心打磨,再创作几近另起炉灶,又几近三载才最终面世。在一些“高产”的“学者”看来,实在不讲效率,但这恰恰反映了学术的正统后继有人,学术的钟摆正回归到应有的学术正道,这一正道,日益开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才俊正驰骋其上,勇敢冲破世俗窠臼和名利羁绊,为繁荣中华真正的学术,为中华崛起而踏实努力,亦即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学术的生命力从来就在民间,就在踏踏实实的耕耘中。天道崇正。天道酬勤。我坚信,周竞风等这批学术新秀,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果。有厚望焉。

是为序。

谢世诚

2015年8月

目 录

序一	朱庆葆	1
序二	谢世诚	3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概况		1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情概况		1
(一) 新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1
(二) 江苏解放和恢复建省		3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组织概况		5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概况		9
(一)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干部的指示		9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迅速发展		12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构成和来源		16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4
(一) 干部队伍迅速壮大和财政压力		24
(二) 干部队伍快速发展造成干部质量下降		25
(三) 干部来源多样和相互间团结合作问题		26
(四) 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		28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和建设		30
一、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		30
(一) 党政机关整编		30
(二) 清理和审查干部		34
(三) 统一调配干部		46
二、进一步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提拔任用标准		50
(一) 原有干部提拔任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50
(二) 进一步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提拔任用标准		52
(三) 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		55
三、建立干部管理新体制		56

(一) 原有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57
(二) 建立“分部”、“分级”干部管理新体制	57
第三章 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理论和政策水平	59
一、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干部	59
(一) 民主革命时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59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马列主义教育的高度重视	64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广泛开展	72
(一)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	72
(二)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76
(三) 大量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员	86
(四)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各地广泛开展	92
三、努力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	97
(一) 高度重视干部的政策学习	98
(二) 广泛开展干部的政策教育	99
第四章 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110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0
(一) 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0
(二) 干部存在作风问题的原因分析	121
二、大力加强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	126
(一) 开展整风运动	127
(二) 整顿党的组织	135
(三) 在“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140
(四) 在新“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149
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155
(一) 坚决纠正干部强迫命令作风	156
(二) 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58
(三) 正确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161
四、建立干部监督约束机制	166
(一) 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166
(二) 成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	168
(三) 法制化、制度化建设的起步	171

第五章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	174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文化基本状况	174
(一) 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174
(二) 干部文化素质低的不利影响	179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文化教育方针和各项政策的确立	181
(一) 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文化教育始终高度重视	181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干部文化教育方针和各项政策的确立	184
三、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189
(一) 干部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189
(二) 各地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192
四、干部文化教育取得的成效	209
(一)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整体文化水平	209
(二) 有效提升干部的工作能力	210
(三) 促进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	211
第六章 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干部队伍	212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专业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	212
(一) 专业干部数量上严重缺乏	212
(二) 专业干部专业水平普遍较低	215
(三) 专业干部队伍管理不规范	218
二、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发展壮大专业干部队伍	224
(一) 中国共产党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高度重视	224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壮大专业干部队伍的主要途径	231
三、进一步加强干部的专业教育	250
(一) 建立各种专业干部学校	250
(二) 依托高等院校开展干部专业教育	253
(三) 举办各类专业讲座、培训班	257
结束语	265
参考书目	271
后记	275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概况

解放战争后期,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客观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干部队伍提出新的要求。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中心任务,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干部队伍,使干部队伍在短期内获得空前壮大。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干部基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着新的历史考验。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情概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建政活动,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政权,初步形成较完备的政权体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在江苏,各地解放以后先后建立起苏北区、苏南区和南京市三个省级行政单位,并随着条件的成熟于1953年重新恢复江苏省建置。

(一) 新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的终结和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历史性巨变。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际,人民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之中,华南、西南等地还盘踞着上百万的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妄图卷土重来。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追歼残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进军华南、西南等地,到1950年10月,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1951年10月,经过谈判,西藏和平解放,至此,中国大陆基本实现统一。

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中,各级人民民主政权逐步建立。在中央,1949年9月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林伯渠为秘书长。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中央人民政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它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由它任命受其领导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以

及随后增设的计划委员会。政务院是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由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等4人为副总理，谭平山等15人为政务委员，李维汉为秘书长，下设政法、财经、文教、人民监察、法制、民族事务、华侨事务等委员会，内务、公安、财政等20个部，以及情报、海关、出版、新闻4个总署等，共计30个工作部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充分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特点，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6位副主席中，共产党员有3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3人；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有29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27人；在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共产党员有2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2人；在15位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有6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9人；政务院所辖4个委员会和30个部、会、院、署、行等机构中，担任正职的共产党员有20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14人。^①

在地方，新中国成立之际，占全国面积约1/3的老解放区已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大的人民政府如1948年9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8月成立的东北人民政府等。在新解放地区，则首先实行军管，“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城市的接收、管理和建立新政权等，“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②

在行政建制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大行政区制度。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决定将大行政区作为省级政区之上最高一级正式行政单位，同时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时，由于华北、东北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其他地区尚需军管，因此新解放地区普遍采取建军政委员会办法。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全国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任命，规定“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随即，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军政委员会相继成立。这样，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共设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五大行政区。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撤销五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统一设华北、东北、西北、中南、华东、西南6个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至此全国正式划分为6大行政区。大行政区的行政机构设置与政务院所属各工作部门相对应，同时领导所属地方各省、市、县人民政府工作，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1950年1月，政务院发布省、市、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对各级政权的隶属关系、组成、职权、机构等一一作出明确的规定。同年12月，《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颁布，确定乡为新政权的最基层组织。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人民政府逐步形成从中央、大行政区、省、县（市）到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区、乡完整的行政组织体系。到1951年,全国共建立29个省、8个省级行署区、1自治区(内蒙古)、1地方(西藏)、1地区(西昌)、13个直辖市,共53个省级行政单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省级政区最多的时期之一。^①

(二) 江苏解放和恢复建省

在新中国地方政权建立过程中,江苏解放和建省是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江苏素以“人文荟萃”著称,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光荣的革命传统。淮海战役以后,江苏各地迅速解放。1949年2月初,苏北全境解放。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垮台。随后,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苏南各主要城市,4月25日无锡解放,4月27日苏州解放,6月2日崇明解放。至此,江苏全境解放。江苏解放过程中,中共中央曾打算渡江后即建立江苏省,但考虑到南京曾是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心,苏南、苏北情况差异较大,情势特殊,中央“决定实行小省制,分别建立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区和南京市。”^②因此,伴随江苏解放,三个具有省一级行政级别的机构苏北行政公署、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先后诞生。

苏北行政公署于1949年4月21日成立,由贺希明任行署主任,贺不久调离后,由惠浴宇接任主任一职。行署成立之初,驻节泰州,下辖扬州(原第二行政区)、泰州(原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南通(原第九行政区)、盐城(原第五行政区)、淮阴(原第六行政区)5大专区,共计39个县(市),5629个乡(镇),人口2080余万,面积6.2万余平方公里。^③原属江淮军区的仪征、六合、淮宝、淮泗、宿迁、睢宁、邳睢铜等县(均系原江苏省辖境),此时分别由苏北行政公署所属扬州、盐城、淮阴各专署管辖。1950年1月1日,扬州、泰州两专区合并。1月11日,行署迁驻扬州。4月15日,苏北行政公署改名为江苏省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仍由惠浴宇为主任。

苏南行政公署在渡江战役前夕即已着手筹建。1949年4月26日,苏南行政公署正式宣布成立。5月16日,行署发布公告:“奉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电令….,江苏省长江以南二十七县划为一行政区,成立苏南行政公署”,“以无锡为公署所在地”。^④苏南行署由管文蔚任主任,刘季平、陈国栋为副主任,辖无锡市和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专区,下辖29个县(市)、1335个乡(镇),人口1250余万,面积2.5万余平方公里。^⑤1950年4月15日,苏南行政公署改名为江苏省苏南人民行政公署,仍由管文蔚为主任。

南京解放以后首先成立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市军管会”),由刘伯承为主

① 《当代中国的民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② 《苏南行政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③ 《当代中国的江苏》(上),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④ 《当代中国的江苏》(上),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⑤ 《当代中国的江苏》(上),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委员共计18人。市军管会驻鸡鸣寺原国民党考试院(今北京东路41号),下设军事接管、政务接管、财政经济接管、交通接管、文化教育、房产管理五大委员会和房产分配委员会,负责接收和管理全市的军事和民政事宜。军管同时,南京市人民政府的筹划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经过一番紧张筹备,1949年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新成立的市政府由刘伯承任市长,柯庆施、张霖之为副市长。不久刘伯承奉令调离,柯庆施随后代理并继任市长一职。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后,原市军管会的工作机构相继改组为市政府工作机构,1949年底,市政府共设有16个局、处、院。此时,南京市共辖13个区,分别以数字1—13排序,面积562.47平方公里,人口860850。^①

与此同时,三地党的领导机构亦相继成立。1949年4月15日,中共苏北区委员会成立,由萧望东为书记,赖毅、万众一为副书记,萧望东、贺希明等8人为委员。5月1日创办《苏北日报》作为区党委机关报。4月28日,中共苏南区委员会成立,由陈丕显为书记,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5人为区委常委,陈丕显、管文蔚等10人为委员。5月6日创办《苏南日报》作为区党委机关报。在南京,1949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的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由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宣传部部长)、陈修良(组织部部长)、陈士榘(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5人为市委常委,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等16人(5月23日增补石西民)为市委委员。9月,中共南京市委调整,由粟裕接替刘伯承任市委书记,唐亮、江渭清分任第一和第二书记。各地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使江苏的各项工作开展有了重要的领导核心。

新中国成立后,江苏各地政权,在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统一领导下,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先后组织实施并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各项社会改革和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重大任务,有力地配合了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推进。随着时间推移,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江苏在行政组织和党的领导上实现统一,建省时机日趋成熟。因此,1952年9月起有关方面开始着手进行恢复建省的一系列筹备工作。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其中第三项规定:“成立江苏省人民政府,并于该省人民政府成立后,撤销苏北人民行政公署、苏南人民行政公署。现属山东、安徽省原为江苏省旧辖之地区,均划回江苏省属。……江苏省人民政府设于南京。”^②据此,1953年1月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举行第一次政府委员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江苏省人民政府,由谭震林任政府主席,柯庆施、管文蔚、冷遹为副主席。省人民政府成立后,苏北、苏南区行政公署随即宣布撤销,而“原属华东军政委员会直辖之南京市,改为江苏省人民政府直辖市。”在此之前,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已经成立,由柯庆施任第一书记,江渭清、萧望东、管文蔚为副书记,柯庆施、江渭清、萧望东、管文蔚、刘

^① 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编:《华东简况》,1951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U4.1-2,第2页。

^② 《当代中国的江苏》(上),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先胜 5 人为省委常委,柯庆施、江渭清、萧望东等 11 人为省委委员。原《新华日报》、《苏北日报》、《苏南日报》亦合并,统一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成立后的江苏省辖徐州、淮阴、盐城、扬州、南通、镇江、苏州、松江 8 个专区,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 6 个省辖市,6 个专区辖市及 72 个县,9783 个乡(镇),人口 4085 万。^①自此,江苏全省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组织概况

新中国的成立和各项事业发展始终离不开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作为干部队伍的组织基础,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息息相关。因此,在考察干部队伍建设之前,有必要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情况。

在经历一系列革命斗争实践磨炼后,解放战争后期起,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空前发展壮大。在党的组织方面,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新建了地方党组织,到 1949 年底,共建有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 6 个中央局,山东、新疆、内蒙古、华南 4 个中央分局,24 个省委和 17 个区党委,134 个市委(内有 6 个中共中央直属市委),218 个地(盟)委,2142 个县(旗)委,15494 个区委,约 20 万个支部。^②在党员人数方面,1949 年初中共党员共计 310 万,年底增至 450 万,几个月后又迅速增至 500 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两年里,党员就猛增 270 多万人,从 1949 年的 310 万人,到 1951 年初的 580 万人,增加了 87%。^③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各级党组织的建立,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但是,由于敌我斗争形势的复杂性,特别是“目前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分子正千方百计企图混入我党组织”,^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迅速发展同时,又明确提出了“审慎”的要求。1949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规定,“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⑤。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采取相应措施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

在江苏,各地党组织发展情况又有所不同。在苏北,党组织发展大致分为老区、恢复区、新区三种情况。对于三地的组织发展,1949 年 5、6 月间,苏北区党委提出了“巩固老区,在巩固中求发展;新区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不断巩固”的建党方针,并要求“大胆吸收工人与贫雇农、贫苦知识分子入党,建立基层党支部”。^⑥据此,苏北各地主要结

① 《当代中国的江苏》(上),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0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5 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 页。

③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党的学说文件汇编》(1949—1957),(内部发行),第 41 页。

④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8 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719 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卷),北京:中共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1 页。

⑥ 《江苏省志·中共志》(第 18 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50 页。

合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进行建党活动,大量吸收在各项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苏北解放一年,党组织和党员人数都获得了较大发展。1949年4月,苏北区有党员人数176281人,支部4385个。到1950年4月,有党员人数294804人(不包括部队党员),新增118523人,占党员总数的40.2%;支部新增1930个,比原来增加了44%,详见表1-1。从表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苏北区党员数在老区、恢复区、新区都有快速发展。当然,这又与中央和华东局先后发出的“审慎”要求不完全相符。因此,苏北区党委在随后的组织工作检讨中指出,由于“没有认真的研究和贯彻,没有及时转入有领导有步骤的巩固教育工作,相反在以后的冬季反霸的运动中,是发展党员最多的一季。”^①此后,苏北区建党工作重点到转入巩固和整理阶段。

表 1-1 苏北区两个时期党员发展数字统计表(1949.5—1950.4)^②

	1949年组工会议以前				1950年4月底数字				一年来的新发展数			
	老区	恢复区	新区	合计	老区	恢复区	新区	合计	老区	恢复区	新区	合计
党员数	125204	27603	4982	177897	215581	61900	17323	294804	70287	34297	12432	116925

在苏南,解放之初共有党的支部816个。1949年7月11日,苏南区党委根据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新区建党要“少而精,宁缺勿滥”的方针,作出《关于目前组织工作的决定》,指出“不分对象,不经过一定组织手续乱发展党员的现象必须纠正,在目前党的发展工作中提出巩固与发展并重的方针也是不对的,必须执行慎重发展和宁缺勿滥的方针”,并决定“目前暂时停止发展党员”,“党的支部的建立,必须根据生产、机关和行政村(乡)的单位来建立支部。”^③根据这一决定,1950年底苏南区新建支部556个,到1952年初苏南区共有支部1577个,1952年6月至9月底又新建支部1158个;党员人数原有25639人,新发展党员11617人。^④1951年初起,苏南区党委根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要求,在组织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分期、分批地进行整党和建党试点工作。

在南京市,1949年4月解放之际,全市共有80个支部,党员2000余人。5月,新成立的中共南京市委首先进行整顿党的组织的工作,决定暂停发展党员,进行公开支部、组织整顿和党员登记。经过整顿、登记,到10月,原中共南京市地下党组织逐步公开,全市共有党员5314人,其中,外来党员占76%,本地党员占24%;正式党员占79%,预备党员占21%;干部党员占73%,勤杂党员占27%。支部共有260个。^⑤1949年11月,南京市开始整党,这是南京市的首次整党,也是新中国唯一一次由地方党委决定开

① 《苏北行政区》,(内部刊印),1994年6月,第104-106页。

② 《苏北两个时期党员发展数字统计表》,江苏省档案馆,3001-3-0042。

③ 《苏南行政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7页。

④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办公厅编:《苏南情况汇编》,1952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U4.2-4,第4-5页。

⑤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编:《南京人民建设史》,(征求意见稿),第106页。